# 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性优势

□ 齐鹏飞

[摘要]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理论与实践，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它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开创了截然不同于历史上和当代世界其它曾经处于和正在处于分裂或分治状态的民族国家实现国家统一之新道路、新模式，充分显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性优势和影响力。

[关键词]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性优势

[中图分类号] D0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470(2012)04－0017－07

[作者简介] 齐鹏飞，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理论与实践，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它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开创了截然不同于历史上和当代世界其它曾经处于和正在处于分裂或分治状态的民族国家实现国家统一之新道路、新模式，充分显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性优势和影响力。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理论与实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经过90余年的“奋斗、创造、积累”，所“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不断发展”的“三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1]的有机组成部分和重要内容，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有机组成部分和重要内容。它在坚决维护当代中国诸如“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等国家核心利益[2]的同时，充分尊重世界各国的正当利益，努力扩大和维护与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把当代中国的自身利益同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谋求互利共赢，共享人类文明进步成果，为当代中国倡导并致力于同世界各国一道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 一、“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中国共产党人为彻底实现国家统一、民族大团圆的最终路径选择

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始，就已经非常鲜明地打出了实现“中华民族大统一、大团圆”的政治旗帜，并将其视为自己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和神圣职责。党关于“国家统一”的理念、战略和政策，始终是在不断的演进、调整和嬗变之中的，一直是在与时俱进地向前发展。90余年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分别以“革命、建设、改革”为主题的三个“三十年”，党关于“国家统一”的理念、战略和政策，经历了三次大的调整和嬗变，呈现出非常鲜明、突出的阶段性特征。

第一个“三十年”，即1921年至1949年间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奋斗的28年，我

收稿日期：2012-06-25

本文系201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概括提炼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研究”（项目编号：11@ZH01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们党提出并实践自己的“国家统一”理念、战略和政策，在领导中国各族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在领导中国各族人民进行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中，逐步推进彻底结束旧中国之一盘散沙的混乱局面、彻底实现中国各族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国家大统一、民族大团结的历史进程。在这一历史时期，党关于“国家统一”的理念、战略和政策，由不自觉到自觉，经历了由模仿和照搬“苏联模式”而主张“民族自决”和“联邦制共和国”的“国家统一”，逐步向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主张符合中国的具体国情的“民族区域自治”和“单一制共和国”的“国家统一”道路嬗变的“历史大拐弯”。最后，终于在20世纪中叶，在彻底“颠覆”旧中国政权的基础上，建立了以中国内陆地区的基本统一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中国各族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二个“三十年”，即1949年至1978年间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进行自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并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30年，我们是以全国执政党的身份和地位，提出并实践自己的“国家统一”理念、战略和政策。新中国成立前夕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必须负责将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解放中国全部领土，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5] 再次庄严地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彻底实现“中华民族大统一、大团圆”的战略目标和历史使命、神圣职责。通过新中国成立以后最初几年间人民解放战争的纵深推进，我们陆续解放了包括内陆和沿海岛屿在内的中国绝大部分领土。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建立、新中国的历史发展进入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后，党在彻底实现“中华民族大统一、大团圆”的战略目标方面，就仅仅剩下了一直延续至今的“三大历史遗留问题”——港澳台问题的严峻挑战。在这一历史时期，党关于“国家统一”的理念、战略和政策，采用的是非常特殊、非常独到的“过渡性方式”——在属于外交领域、外交范畴的“港澳问题”上，我们坚持“暂时维持港澳现状不变”以“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八字方针”；在属于内政领域、内政范畴的“台湾问题”上，我们坚持争取用和平的方式——当然也绝不排除用武力的方式来实现“解放”。当然，在这一历史时期，党关于“国家统一”的理念、战略和政策，不管其“过渡政策”有多么特殊，“过渡时期”有多么长，其战略目标是简单而明确的——那就是“一国一制”。

第三个“三十年”，即1979年至今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顺应当代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新的时代主题和日益凸显的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发展趋势，顺应当代世界自两极对立的冷战时代向政治多极化的“后冷战时代”过渡的历史发展趋势，顺应当代中国将工作重心全面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全力争取对我们有利的和平、稳定的国际形势和周边环境的历史发展趋势，在致力于“和平崛起”、“和平发展”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的同时，也致力于与世界各国一起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地区”、“和谐世界”的历史发展趋势，在解决彻底实现“中华民族大统一、大团圆”方面的“三大历史遗留问题”——港澳台问题方面，创造性地提出了极具“天才般的想像力”的“新思维”和“新模式”——“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也就是说，我们将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推进彻底实现“中华民族大统一、大团圆”的和平进程（当然，同时，为了最后的和平，我们也绝不作出放弃使用武力的承诺），并以“求一国之大同、求两制之大异”的特殊方式，在保持居于主体地位的中国内陆地区社会主义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容许周边的港澳台地区继续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也长期不变，以实现两岸四地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正是根据这一全新的关于“国家统一”的理念、战略和政策，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经过不懈努力和艰苦奋斗，彻底洗雪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所蒙受的殖民主义的历史耻辱，代表中国政府分别在1997年7月1日和1999年12月20日对港澳地区恢复行使主权，实现了几代中华儿女梦寐以求的港澳回归之夙愿；正是根据这一全新的关于“国家统一”的理念、战略和政策，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经过不懈努力和艰苦奋斗，打破了台湾海峡两岸自20世纪中叶以来就完全隔绝并长期对立的冰冻局面，实现了两岸关系的历史性突破以及以直接“三通”为主

要标志的全面交流，并逐步推动两岸关系演进，为未来的“和平统一”作长期积淀和全面准备。

对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这一伟大历史进程的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明确指出的那样：“宣告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这是中华民族的盛事，也是世界和平与正义事业的胜利。”[4]“中国政府庄严宣告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这一中华民族的盛事将永远彪炳史册！……澳门的回归，也是世界和平与正义事业的伟大胜利。这再一次证明，人类进步的历史潮流是任何力量也不能阻挡的。”[5]也正如胡锦涛同志所明确指出的那样：“解决台湾问题的核心是实现祖国统一，目的是维护和确保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追求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幸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也符合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时代潮流。”“中国的统一，不会损害任何国家的利益，只会促进亚太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只会有利于中国人民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6]

## 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对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和基本国策的思想来源和理论基础，有两个基本点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一方面，这是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现代化”的继承、发展和创新；另一方面，这是对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进行“中国化”的继承、发展和创新。而其精神之魂就是“实事求是”。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国家学说的经典论述中，并没有直接而具体地涉及到关于民族国家之国家统一及其实现路径问题的相关内容，但是，他们关于“世界历史”问题的理论阐释，他们关于民族国家之国家形式（国家结构）问题——包括“联邦制”问题的理论阐释，他们关于民族国家之“特殊时期”“缓和冲突”的“调停人”功用问题的理论阐释，他们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特定条件下“和平共处”问题的理论阐释等等，无一不给苦苦探寻实现中华民族的大统一、大团圆新道路、新模式的中国共产党人以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启示。正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国家学说的经典论述出发，中国共产党人秉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基本国情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新中国在全球化时代实现国家统一和中华民族大团圆的新思维、新途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和基本国策，并付诸实践取得巨大的成功。

对于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和基本国策的奠基人和“总设计师”邓小平曾经论述得非常透彻。他明确指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主要是在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形成的。这个构想是从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出发的。十亿人口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会改变的，永远不会改变。但是，根据香港和台湾的历史和实际情况，不保证香港和台湾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就不能保持它们的繁荣和稳定，也不能和平解决祖国统一问题。”[7]“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毛主席的实事求是的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事实，尊重实际。就是要尊重香港和台湾的历史实际。”[8]“实事求是是毛主席坚持的思想路线。他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我们把它继承下来了。中国遵循这一原则解决自己错综复杂的问题，并且已经见效。我们也正在按照这些原则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9]“和平共处的原则用之于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某些问题，恐怕也是一个好办法。根据中国自己的实践，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这也是一种和平共处。……和平共处的原则不仅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而且在一个国家处理自己内政问题上，也是一个好办法。”[10]“在一个统一的国家内，有不同的社会制度，这是史无前例的。实际上，真正统一了，台湾一个制度，香港一个制度，大陆一个制度，大陆是社会主义制度。以社会主义制度为主体的国家包含不同的制度，马克思没有讲过这个问题，我们大胆地提了，如果不这样设想，绝对不可能统一。这样的设想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是符合毛主席的实事求是精神的。历史上理解马克思主义最好的是列宁和毛泽东，他们根据马克思主义把本国

革命引向胜利，核心就是实事求是。”[11]“我们正在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来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香港、台湾问题，从中国内部来讲，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这是个新的问题，也是新的想法，马克思没有说过，列宁也没有说过。这是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面临的必须解决的新问题。从本质上讲，就是实事求是，这是合乎马克思主义原则的。”[12]“如果‘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一个对国际上有意义的想法的话，那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我们提出这个构想时，人们都觉得这是个新语言，是前人未曾说过的。也有人怀疑这个主张能否行得通，这就要拿事实来回答。”[13]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中国，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和基本国策指导下实现的香港回归、澳门回归和两岸关系的重大突破以及和平发展，正是以活生生的成功实践，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科学性及其巨大的生命力和深远的影响力。

2008年12月18日，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在全面回顾和总结新时期“三十年”“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取得成就的基础上，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新的伟大成就”时明确指出：“我们成功实施‘一国两制’基本方针，祖国和平统一大业迈出重大步伐。香港、澳门回归祖国，‘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得到全面贯彻执行，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保持繁荣稳定。祖国大陆同台湾的经济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不断加强，两岸政党交流成功开启，两岸全面直接双向‘三通’迈出历史性步伐，反对‘台独’分裂活动斗争取得重要成果，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呈现新的前景。”[14]

## 三、“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中国在全球化时代开创的实现国家统一的新道路、新模式

自17世纪中叶“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以来，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和“雅尔塔体系”崩溃，这种由各个民族国家构成国际关系、国际社会和国际法基本单元和主体的世界秩序、世界格局，以及国家主权至上、国家利益至上的基本理念、基本原则，尽管遭遇到来自日益强化和彰显的全球化趋势的严重冲击和挑战，但是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或调整。因此，如何实现和维护民族国家之国家统一这一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老问题，仍然是摆在世界各国当局者面前棘手的重大现实问题。

在中国“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和基本国策提出并付诸实践前后，国际社会也曾经出现过各式各样的国家统一模式，如美国的“南北战争模式”、“越南模式”、“也门模式”、“德国模式”等，其共同点主要有二：一是“武力解决”，二是“一国一制”。其巨大的正面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其弊端和消极影响也同样无法回避——最主要的，就是主导方不得不利用“武力和强权”等极端手段来实现和维护国家统一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和种种“后遗症”。

正因为如此，中国“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和基本国策的提出并付诸实践，就开创了截然不同于历史上和当代世界其它曾经处于和正在处于分裂或分治状态的民族国家实现国家统一之新道路、新模式，它创造性地吸收和借鉴了中国历史上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实现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一切积极思想营养，创造性地吸收和借鉴了世界历史上和当代世界各国实现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一切积极思想营养，充分显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性优势和深远影响力。以和平统一的方式、“一国两制”的方式实现和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符合当代世界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主题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的时代潮流，符合中国人民的核心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是社会主义新中国在政治文明方面的伟大创举，是社会主义新中国对于人类和平和正义事业的伟大贡献。

对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这一实现和维护国家统一的新道路、新模式的国际意义和国际影响，邓小平曾经有过非常全面和系统的阐释。邓小平明确指出：只有“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才能以和平的方式彻底解决和消弭国际争端——“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世界上的许多争端用类似这样的办法解决，我认为是可取的。否则始终顶着，僵持下去，

总会爆发冲突.甚至武力冲突。如果不要战争,只能采取我上面讲的这类的方式。这样能向人民交代,局势可以稳定,并且是长期稳定,也不伤害哪一方。……总要从死胡同里找个出路。”[15]“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看只有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世界上一系列争端都面临着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还是用非和平方式来解决的问题。总得找出个办法来,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来解决。香港问题的成功解决,这个事例可能为国际上许多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有益的线索。从世界历史来看,有哪个政府制定过我们这么开明的政策?从资本主义历史看,从西方国家看,有哪一个国家这么做过?”[16]“我很有信心,‘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能够行得通的。这件事情会在国际上引起很好的反应,而且为世界各国提供国家间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一个范例。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也考虑到解决国际争端应该采取什么办法。因为世界上这里那里有很多疙瘩,很难解开。我认为有些国际争端用这种办法解决是可能的。我们就是要找出一个能为各方所接受的方式,使问题得到解决。过去,好多争端爆发了,引起武力冲突。假如能够采取合情合理的办法,就可以清除爆发点,稳定国际局势。”[17]“现在世界上有好多潜在的爆发点,还有一些地方存在着两国之间的主权争端问题。如果不根据新的问题采取新的方法,就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中国是一个大国,要解决这些问题总要有点新的办法。世界上还有其它问题,比如英国马岛问题,现在并没有解决,联合国议程上还有这个问题。这样的事情多得很。这些问题都可能是爆发点,解决的方式,或是战争,或是其它办法。和平谈判,就要双方相互让步。……‘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和共同开发解决争端的办法,都是为了和平而不用战争方式,都叫和平共处。”[18]“解决国际争端,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法。‘一国两制’,是从我们自己的实际提出来的,但是这个思路可以延伸到某些国际问题的处理上。好多国际争端,解决不好会成为爆发点。我说是不是有些可以采取‘一国两制’的办法,有些还可以用‘共同开发’的办法。……世界上这类的国际争端还不少。我们中国人是主张和平的,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什么样的和平方式?‘一国两制’,‘共同开发’。同我谈话的外宾,都说这是一个新的思想,很有意思。”[19]

邓小平明确指出:只有“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才能以各当事方都可以接受的互利共赢方式彻底解决和消弭国际争端——“‘一国两制’,马克思没说过,世界历史上没有过。”[20]“‘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是我们根据中国自己的情况提出来的,而现在已经成为国际上注意的问题了。中国有香港、台湾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何在呢?是社会主义吞掉台湾,还是台湾宣扬的‘三民主义’吞掉大陆?谁也不好吞掉谁。如果不能和平解决,只有用武力解决,这对各方都是不利的。”[21]“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22]“‘一国两制’是从中国的实际提出的,中国面临一个香港问题,一个台湾问题。解决问题只有两个方式:一个是谈判方式,一个是武力方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总要各方都能接受,香港问题就要中国和英国,加上香港居民都能接受。什么方案各方都能接受呢?就香港来说,用社会主义去改变香港,就不是各方都能接受的。所以要提出‘一国两制’。”[23]“中国在不长的时间内解决了香港问题、澳门问题,为处理国际上有争议的问题树立了一个范例。我们考虑用何种方式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的立足点是,解决香港问题不仅要符合中国的利益,还要符合英国和香港的利益;解决澳门问题不仅要符合中国的利益,还要符合葡萄牙和澳门的利益;而解决台湾问题,则既要符合大陆的利益,也要符合台湾的利益。我们经过较长时间的考虑,从解决台湾问题着手,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受台湾问题的启发,我们考虑用同样的方式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看来,用‘一国两制’方式解决这类问题是成功的,为解决国际争端、消除热点问题提供了经验。”[24]

邓小平明确指出:只有“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才能真正体现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制度性优势和鲜明特色——“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老早就确定了的,写在宪法上的。我们对香港、澳门、台湾的政策,也是在国家主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制定的,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的社

会主义，谁能够制定这样的政策？没有哪个人有这个胆识，哪一个党派都不行。你们看我这个讲法对不对？没有一点胆略是不行的。这个胆略是要有基础的，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才制定‘一国两制’的政策，才可以允许两种制度存在。没有点勇气是不行的，这个勇气来自人民的拥护，人民拥护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党的领导。……要保持香港五十年繁荣和稳定，五十年以后也繁荣和稳定，就要保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特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对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处理，就是‘一国两制’。这是个新事物。这个新事物不是美国提出来的，不是日本提出来的，不是欧洲提出来的，也不是苏联提出来的，而是中国提出来的，这就叫做中国特色。……试想，中国要是改变了社会主义制度，改变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香港会是怎样？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也会吹的。要真正能做到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以后也不变，就要大陆这个社会主义制度不变。……‘一国两制’也要讲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里允许一些特殊地区搞资本主义，不是搞一段时间，而是搞几十年、成百年。另一方面，也要确定整个国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否则怎么能说是‘两制’呢？那就变成‘一制’了。”[25]“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改变了中国的形象。中国今天的形象，不是晚清政府、不是北洋军阀、也不是蒋氏父子创造出来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变了中国的形象。”[26]“香港问题为什么能够谈成呢？并不是我们参加谈判的人有特殊的本领，主要是我们这个国家这几年发展起来了，是个兴旺发达的国家，有力量的国家，而且是个值得信任的国家，我们是讲信用的，我们说话是算数的。……我们国家的形象变了，国内的人民看清了这一点，国际上也看清了这一点。……使中国人站起来的，不是蒋介石，而是共产党，是社会主义。”[27]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和基本国策提出并付诸实践以后，在国际社会赢得了广泛赞誉。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曾经高度评价“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是“最有天才的创造”，她指出“‘一国两制’的构想，即在一个国家中保留两种不同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是没有先例的。它为香港的特殊历史环境提供了富有想象力的答案。这一构想树立了一个榜样，说明看来无法解决的问题如何才能解决以及应该如何解决。”[28]前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也曾经表示非常欣赏中英两国政府通过外交谈判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特殊方式”，他指出“这是中英两国政治家风度的又一体现。因为你们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式。”“这一类协议，恰恰是我们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非常需要的。”“中英两国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正是我们要大力加以提倡的。我认为，这不仅仅是解决多边和国际问题的具体方式，还反映出善意和决心。”[29]中英两国政府经过努力，通过外交谈判成功地解决了一个“非常微妙和复杂的问题”。“在紧张和对抗不幸地笼罩着世界上许多地区的时候，对香港未来地位的谈判取得成功，将毫无疑问地被认为是在当前国际关系中，有效的、静悄悄外交的一项极为突出的范例”。这对于相信通过建设性的对话“能够克服最可恼的障碍的人来说是一个鼓舞”。[30]

探根究底，中国近代以来，为什么只有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才能够发动和领导中国各族人民结束旧中国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混乱局面，彻底实现无数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夙愿——“中华民族大统一、大团圆”的历史使命和神圣职责？为什么只有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才能够发动和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全面、彻底地解决以往历届中国政府和各种政治势力均无法、无力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港澳问题而实现港澳回归？为什么只有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才能够发动和领导中国各族人民打破了台湾海峡两岸自20世纪中叶以来就完全隔绝并长期对立的冰冻局面，实现了两岸关系的历史性突破以及“和平发展”，并初步奠定彻底实现中华民族之大统一、大团圆和实现中华民族之伟大复兴的不可逆的发展趋势和光明前景？探根究底，为什么在当代世界，只有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能够把继承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同学习借鉴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结合起来，坚持自身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的一致性，充分反映和体现当代世界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主题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的时代潮流，创造性地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这一截然不同于历史上和当代世界处于分

裂或分离、分立状态的民族国家实现国家统一的新道路、新模式，极大地丰富和深化了当代世界实现和维护民族国家之国家统一的思想内容和路径选择，为全人类的和平和正义事业作出了伟大贡献。因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不仅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根本意志的忠实代表者，同时也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和意志的忠实维护者，是真正反映和体现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和趋势的“负责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国、强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本身就是对世界负责任最重要的体现。”[31] 而中国共产党，就是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核心力量。“事实充分证明，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壮阔进程中，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32] 历史已经昭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的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一个能够彻底实现“中华民族之大统一、大团圆”的新中国！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并祝愿，在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各族人民完全可以在有预期的将来，彻底实现国家统一的历史使命和神圣职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让中国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并为全人类发展进步作出应有贡献”[33]。

注释：

[1] [12] 胡锦涛.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1-7-2.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2011 年 9 月）[N]. 人民日报. 2011-9-7.

[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732.

[4] 江泽民文选[C].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651.

[5] 江泽民文选[C].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486-487.

[6] 胡锦涛. 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 3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09-1-1.

[8] [9]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祖国和平统一促进委员会编. 邓小平论祖国统一[M]. 团结出版社，1995：36，29.

[7] [10] [13] [15] [16] [17] 邓小平文选[C]. 人民出版社，1993（3）：67，96-98，101，49，59-60，68，84-88，59-60，49，84-88，215-222，59-60，84-88.

[11] [22] [18] [20] [24] 邓小平年谱（1975—1997）[C].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下）：914，993-994，993-994，997，381-382.

[14] 胡锦涛. 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3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08-12-19.

[28]《联合声明》是英中关系历程中的一个里程碑——撒切尔首相在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签字仪式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1984-12-20.

[29] 联合国秘书长说中英解决香港问题方式应大力提倡[N]. 香港：文汇报，1984-9-26.

[30] 联合国秘书长赞扬中英谈判成功是外交范例[N]. 人民日报，1984-9-28.

[31] [3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N]. 人民日报，2011-9-7.

责任编辑：杨艳萍